

我有嘉宾 载言载笑

清代文人的无锡园林雅集

| 任翌文 |

文化圆桌



古代文人雅集的滥觞，是汉魏之际的邨下文人胜游，典范则是东晋的兰亭雅集。这之后的文人，或追慕前辈神采，或欣羨晋人风流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对往古先贤的模仿，所谓“觴酌流行，丝竹并奏。酒酣耳热，仰而赋诗”。明代文人的文社、诗会多如牛毛，受这种风气影响，无锡一邑的诗文社，如耆英社、惜阴社、碧山吟社等也层出不穷。明清易代，经暂时消歇后，以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顾贞观等在无锡惠山成立“云门社”为代表，重又开始文会雅集，参与的“云门十子”，都是一时之俊异；又有汤斌、汪琬、陈维崧等大佬参与盛会，一时名动远近。

但文人结社，谤议朝政和游心逸乐，这是最容易落下口实的两端，也会起到潜在的消解威权、破坏秩序的作用，深为统治者所忌惮，故在顺治九年和十七年，朝廷即两次下令禁止文人结社集会。然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“奏销案”发，大批江南文士被黜落民间，如叶梦珠所记的“江南英俊，销铄殆尽”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除了少数人“幸成蜗角名，十年无品级”，绝大部分则再无出头之日，一生为衣食而仓皇奔走。于是，失意文人借以“文酒之会”的形式，聚集在一起，聊以排遣和娱情。

康熙二年，降贬到无锡任知县的吴兴祚，很快与当时失意的江南文士形成心意上的共鸣和沟通，如其在《念奴娇·春申洞怀古》中所表达的：“云起楼前，天均堂外，兴废谁堪别。春申古洞，云烟樵客能说。”

吴兴祚到任以后，即葺理旧构，先后筑二泉亭、云起楼，后来又相继修复衙署的谯楼“来悦楼”，并建“听梧轩”“尺木堂”等。而秦松龄家的寄畅园、顾岱在明施策大池别业基础上构筑的大池园墅也早已完工，侯杲的亦园也筑成。这些园池楼阁多出自名家张南垣、张弮之手，特别是云起楼和寄畅园，闻名遐迩，引来江南文人的纷纷游观，并成为举行文酒之会的最佳去处。

一 云起楼、寄畅园雅集

吴兴祚在康熙四年筑惠山“二泉亭”；康熙六年建“云起楼”成，致书吴伟业，期待他以宗人的身份来访。故康熙七年九月，吴伟业受邀来谒，并为作《云起楼记》。与吴伟业同来的，还有太仓顾湄、慈溪姜宸英等。相陪的无锡文士有严绳孙、刘雷恒、霖恒兄弟，顾宸、顾天石父子等。

吴伟业的到来，使得这次文会成为自“奏销案”之后的一次空前的盛会。吴兴祚和秦松龄分别作为地主，邀集众人，游云起楼，游寄畅园，诗词唱和，宾主尽欢。吴伟业在《云起楼记》中颂明府吴君之治政清明，大兴艺文，引四方来集，使得天下憔悴之徒“乐其水泉之甘，云物之美”，人不思归。姜宸英也写有《云起楼记》和《惠山秦园记》。吴伟业的寄畅园“三咏”，分别赋咏了山池塔影、惠井支泉、宛转桥。众人也纷纷落笔，各有吟“云起楼”“寄畅园”的诗（词）章。

吴伟业的无锡弟子不少，邹漪、顾宸、邹黎眉都是吴伟业的及门弟子；华章庆、顾贞观都曾从吴游。特别是无锡邹氏，吴伟业说：“盖余之交于邹氏者三世矣。”

二 听梧轩、尺木堂雅集

吴兴祚主持招引的雅集主要在两个地方：一是惠山云起楼，一是城中衙署的听梧轩、尺木堂。

康熙八年十月，吴兴祚张宴云起楼，叶方蔼记：“坐客十人，皆四方之豪英与邑中之名彦也。”（《云起楼公燕诗序》）叶方蔼之外，还有徐乾学、刘雷恒兄弟、秦松龄等。这次雅集之后，诸人唱和诗结集为《云起楼公燕诗》。

康熙十年，正是吴兴祚四十寿诞，四方名士有十六人来贺，众人燕饮于尺木堂中，“酒半，各分韵赋诗，成若干首，汇书卷中，而命予为序。”（陈玉璫《尺木堂公宴诗序》）写序的陈玉璫是武进人，素有捷才，下笔动辄千言；当日宴集罢，应吴兴祚之请还写有《夜饮尺木堂》十二首，唱和吴当日在亦园雅集的诗作，也借以记今日之盛。

云起楼和寄畅园，在空间距离上很近，此间彼处，先你后我，不分轩輊。所以在众人赋咏的诗文中，必定有云起楼，也有寄畅园；有颂吴伯成明府，也有赠秦太史留仙。正如陈玉璫所描绘的：“为文酒之会，五邑同人大集惠山，极一时歌舞嬉游之乐。”

康熙十二年，余怀再次来锡，与陈玉璫、嵇永仁等相聚。这次聚会是因嵇永仁为范承谟所聘，将至福建幕府做事，吴兴祚招引众人为他践行。嵇永仁后来在《憔悴吟》序中记述此次集会：

癸丑秋，邑侯吴公饯余于听梧轩，招集秦太史对岩、陈进士椒

吴伟业在江南文士中影响很大，顺治十年虎丘“十郡大会”后，成为当然的“宗主”。顺治十八年“奏销案”起，吴伟业亦被褫，又为他事所累，几至破家。吴兴祚的这次邀集，使吴伟业兴致很高，与梁溪文士的交流唱酬也更加密切。康熙九年八月，吴伟业又至无锡，与余怀、秦松龄、毛奇龄、杜濬等宴游，座中还有苏昆生。这个成员复杂的群体，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无锡地区所集聚的不同身份的文士群体，这些人在寄畅园“互诉前朝，好言隐事。醉者振巾，醒者促骂”（毛奇龄《与秦留仙翰林书》）。若干年后，秦松龄的后人秦瀛记述吴伟业的这次到访：

“暮雨清尊故国春，白头祭酒话前尘。座中犹有何戡在，旧是征南幕下人。”（《咏梁溪杂事一百首》）



峰，暨词客曼山夫、余澹心，诸子同拈《踏莎行》调，末以“憔悴”二字限韵。词中有“孤城残角梦家山，乱帆影里人憔悴”之句，余心怆怆动。

“招携宾客置饯觞，吐词制调魂飞扬”（《憔悴吟》）嵇永仁此去，真是舍身成仁。

陈维崧也是常客，并在康熙十三年有较长时间在无锡逗留，后来他说的“客梁溪”即指此。春天时，陈维崧来访无锡教授郝毓蓂；随后又在郝氏生日时，与杜濬、苏昆生、陈集生等聚集在其教谕署中观剧，有一组《满江红》词并纪事。又与杜濬等于雨中一起去钱肃润的“十峰草堂”饮酒，作《渔家傲》词。钱肃润是前明诸生，鼎革后隐居教授弟子，被尊为东林老都讲，在吴地声望很高。

秋天时，陈维崧又到无锡，与鲍让侯、杜濬、华长发、龚云起等老友相聚，游城南诸寺，前后待了十多天，下榻于龚佩纫宅中。陈在《沁园春·赠别龚佩纫》词中写道：“十日联床，一尊下榻，白饭青刍累素交。”情深义重的旧友，给了晚年窘困中的陈维崧无限慰藉。

陈维崧说：“侧闻邻县有神君，治行吴公今第一”，这种一传十，十传百的“江湖效应”，使得吴兴祚幕府集聚了许多中下层文士。吴兴祚康熙二年到任，至康熙十五年离开，这个时期是梁溪词人群体创作的重要时期，以严绳孙、顾贞观、秦松龄为代表，都是当时各种雅集的核心人物。

三 宾娥台雅集

“宾娥台”是明代安希范在万历年间所筑，当年东林诸子群集唱和，亦一时盛会。康熙初期，安希范之孙安璠召集雅会，与会的有严绳孙、顾贞观、秦松龄、秦保寅、邹黎眉等“云门诗社”成员；还有陆楣、华长发、陈卿茂等本地名贤；县令吴兴祚也参与。后来顾柔谦、顾祖禹父子先后至，也有和作。众人景仰先贤之气节，追慕先人之雅怀，纷纷吟咏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对万历时东林先贤雅集的直接模拟。

四 侯氏“亦园”雅集

康熙时期，雅集的地点，除了上述寄畅园、云起楼之外，另一个重要地点就是侯氏的亦园，这个文人圈主要以侯氏：侯杲、侯晰、侯文燦、侯文耀、侯文煜等为核心，旁及侯氏兄弟的舅舅华侗，还有友好万树、弘伦、华长发、陈大成等，大部分人在侯晰所辑的《梁溪词选》中有词集存世，如华侗有《春水词》，侯文煜有《鹤闲词》，华长发有《语花词》，宏伦有《泥絮词》。陈大成词集未入选，也有《树影楼词》。

清初在词曲方面颇有建树的宜兴人万树（1630—1688，字红友），在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之前，有较长一段时间与侯杲、侯文燦父子切磋词曲。侯文燦与万树亦友亦师，两人“日坐亦园，始共事词律”，钻研词曲音律，这是万树《词律》写作之始。

在这个阶段，万树与侯氏父子，以及围绕周围的文人圈相处，尤其与梁溪词人华侗、陈大成、侯文煜等感情甚密，彼此唱和之作颇多。华侗是侯杲的妻舅，又是儿女亲家。陈大成与陈维崧同族，幼时曾从陈维崧学习。万树与他们交好并彼此之间往来唱和不断，这也促进了阳羡词人和梁溪词人群体在词风、词学观念上的相互交流、借鉴和融合。

清初禁止社集，但以家族成员为核心的诗文社及唱和活动从未停止，如《梁溪词选》中侯文煜《鹤闲词》后附有《中秋倡和词》一卷，就是当时以侯氏家族为核心的家族成员的唱和词集。甚至如邹黎眉家族中还成立“画社”，家族成员每月在固定的时间相聚，切磋交流画艺，挥毫泼墨，诗词唱和。

综上，清初这些文酒之会，以“云门十子”为基本成员，集五邑同人，诗词唱和，扬花风雅，这是康熙前期梁溪文人群文学活动的特点。高压之下，文士不敢结社，也不敢再像明代文人那样高调地谈论道德政治，“文酒之会”更倾向于较为纯粹的艺术活动。但雅集的效应，那种综合了诗词、书画、戏曲、音乐的艺文活动，客观上促进了本地及整个吴地文学圈的交融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。

